

入蜀记校注

蒋方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欧美名流的情人们》姊妹篇。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东南亚等国社会名流的婚外恋故事。

书名：入蜀记校注

作者：蒋方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ISBN：7-216-04247-6/1264.42

出版日期：2005年5月

印张：11.5 开本：32

定价：20.00元

目录

前 言	1
第一卷	1
第二卷	48
第三卷	85
第四卷	122
第五卷	158
第六卷	198
附 录	
一、《宋史·陆游传》	239
二、《入蜀记》版本题记及评论	242
参考书目	251

入蜀记校注

前言

陆游，南宋著名的诗人，“六十年间万首诗”，创作数量大，而且成就高，当时便与杨万里、范成大、尤袤有“四大家”之称，而位居首位。陆游的诗作洋溢着充沛的爱国主义情感，千百年后，依然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最为人所熟悉的自然是他的《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撒手人寰的流连之际，面对拥围床榻的亲人，该有多少儿女情长的眷恋，该有多少家长里短的叮咛，该有多少对生命不再的哀伤，而陆游的唯一牵挂只是祖国疆域尚未统一，“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脱口而出。人去天国，心系热土，殷殷期待，谆谆嘱托，这是何等深刻的爱国情感！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一种深铭骨髓的爱国激情源自何处呢？那么，读一读陆游的《入蜀记》吧。读《入蜀记》，不仅能换一个角度来体察陆游的爱国情感，更能使我们理解他的爱国情感是植根于祖国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植根于祖国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其感情之宽广，之深厚，之博大，丝丝缕缕，细致入微，可感可触。如果说，陆游的诗是他情感涌动的瞬间记录，而《入蜀记》这部日记体的游记之作则记

录了陆游人生中的一段历程，在一定的时空里展现一位爱国志士的步履行迹和心理感应。

《入蜀记》文笔简洁而优雅，无论在中国游记史上还是中国日记史上，都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它表明，陆游不但是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者。

《入蜀记》写在陆游的仕宦人生的一个低谷时段。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的祖父陆佃，是北宋著名的学者，曾从王安石问学，著有《埤雅》、《春秋后传》、《陶山集》等，官至尚书右丞。他的父亲陆宰，北宋末，官转运副使，南渡后，力主收复而受到秦桧之流的压抑，多在投闲置散之地。陆游少年即能诗文，以门荫补登仕郎。此后他曾二度赴临安应试而不第，直到三十四岁时方被授予福州宁德县主簿一职，正式进入仕途。任职期满，他以举荐入京，担任敕令所删定官，迁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禅位于太子赵昚，是为孝宗，次年改元隆兴。孝宗颇为赏识陆游的才华，赐给他进士出身，迁官枢密院编修，兼圣政所检讨官。

这是陆游一生仕宦中最为畅快的时期，他怀抱抗金恢复的政治志向，热情地投入到朝廷政事之中。他参预国家机密文件的起草，参与高宗朝政事诏令的编撰，颇受信任。他曾上书议政，请除积弊，增强国力；他曾蒙诏入对，面请北征，“泪溅龙床”；他曾代拟论事札子，分析抗金大计的利弊。他有诗回忆此时情景：“往时草檄喻西域，飒飒声动中书堂。（自注：余尝草丞相鲁公以下与夏国主书于政事堂。）”（《醉后草书歌诗戏作》）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也正是在他仕途顺利、心情愉快之时，风波骤然而起。隆兴元年（1163），孝宗宠用龙大渊与曾觌，引起一些正直的朝士的不满，陆游也参与批评议论，而惹恼孝宗，遂在五月被免去枢密院编修官之职，出为镇江通判。

隆兴二年（1164）三月，张浚视师淮上，到镇江。张浚与陆游的父亲相识，与陆游有世家之谊。他赏识陆游的才华，在政治上又声气相投，在镇江时，陆游前往拜谒，顾遇甚厚。陆游因与他的儿子张栻，幕僚陈俊卿、冯方、查籥等结识，往来密切。张浚是孝宗朝中力主用兵的大将。张栻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曾向孝宗慷慨陈辞：“继今以往，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迟以岁月，何功之不济哉！”陈俊卿等同为有志向有才干的主战派人士而为张浚收至幕下。因此，尽管此时的陆

游正遭遇排斥，却可以想见，在统领军事的张浚的麾下，在前沿之地的镇江，能与这些才志之士结识相聚，对于志在抗金复兴的陆游，一定是很大的鼓舞。他在晚年时回忆起这段交往，充满了怀念之情。但是，龙大渊等借张浚在外，在孝宗面前诋毁张浚。四月，张浚奉召还朝，即被罢去相职，出判福州，同年八月在忧郁中去世。张浚的罢职与去世，对于期待实现报国志向的陆游，无疑是一个打击。

乾道元年(1165)七月，陆游改任通判隆兴府军事，遂由镇江往赴南昌。此时隆兴府长官是陈之茂。他当年主持锁厅考试时，不顾秦桧的旨意而擢陆游为第一，居于秦桧之孙秦埴之上，曾触怒秦桧，于陆游有师门之恩。陆游的调任南昌，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是因为他的从兄陆沅时为提举两浙市舶，镇江在其辖区之内，陆游循例应当回避，而隆兴通判毛钦望与安抚使陈之茂“职事不协”，故相调换。看起来，这应当是一次正常的调动，而能与陈之茂共事相处也应有愉快之感，但在陆游上给陈之茂的谒见文书中却流露出了对当政者的许多怨意，因此，调任的背后其实有着朝廷中权势斗争的影响，恐怕与陆游反对龙大渊、曾觌的用事不无关联，其中也有他与张浚交往密切的原因。实际上，在到达南昌的第二年，陆游即因“交结台谏，

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被罢去官职,证实了看似正常调动背后的人事险恶。于是,陆游回到故乡山阴闲居。

这一次仕途的浮沉起落,深深地挫伤了陆游的政治进取心,却也使他对宦场的复杂、朝政的淆乱充满愤慨与忧虑,而对于兴复中原的事业,心怀渴望与焦灼。孝宗乾道五年(1169)的十二月六日,他接到朝廷的差遣通报:以左奉议郎差通判夔州军事。在此之前,主战抗金的王炎以参知政事出任四川宣抚使,六月上表,请依前任虞允文之例辟置僚属,获准后,便邀请陆游加入幕府。此时陆游已在山阴闲居了三年有余,王炎所去,又是抗金的西北前线,能获得辟请,受到重视,总是令人高兴的。而面对这两项差使,陆游自然以服从朝命为先。于是,他一面以《谢王宣抚启》向王炎致谢,一面又写了《通判夔州谢政府启》,接受差命,准备前往夔州。夔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奉节县,距山阴有千里之遥。陆游此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携家眷作长途之行,要筹措旅费,要准备行资,而他本人此时又值久病初愈,经不起长途跋涉的劳顿,遂决定于第二年的夏天启行。

赴任夔州,在当时,是陆游的一个重大决定。他以病弱之身而作江上的长程之行,路途的艰辛可以想见,何况还要携带家眷,身有照应之责。他退居山阴,家有

田园，生活虽不宽裕，却也不愁衣食，而作全家的长途旅行，要雇船，要备粮，这笔资费非借贷无从着落。而求贷并非易行之事。面对种种艰难而最终作出决断，也许正是此前的仕宦经历促动了陆游的选择：夔州虽遥远，却也远离了朝廷官宦的纷争；夔州虽僻陋，却风俗淳朴，民心可爱；夔州地近西北抗金前线，待他友好的王炎正在那里主政；凡此种种考虑，使他下定决心，靠向亲友借贷而凑足旅费，携带着弱妻幼小，不辞蜀道之难，不惧千里迢迢，远赴夔州通判的微职。因此，赴任夔州，在陆游，是人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故而自出发的当晚，他便开始了日记的写作。这写作，不仅是为了记录下长途旅程之中的所见所想，写作本身也成为这位政治上的漂泊者在孤独状态中的伴侣。

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十八日，陆游告别送行的亲友，携带家小，从故乡出发，沿着运河，一路舟行，经萧山，入临安，过秀州(今浙江嘉兴)、吴江(今江苏吴江)、常州(今江苏常州)、丹阳(今江苏丹阳)，抵镇江，由此进入长江航道，其时已是六月底。进入长江以后，乘舟逆水而上，陆游携带家人，沿途停靠，补给生活，也游览山水名胜，访问故人，而风雨辛苦，不止一端，到十月二十七日方抵达夔州。这近乎半年的行程，他都以日记的形式，或繁或简，一天不落地作了记载，遂成《入蜀记》六卷。

二

陆游在《入蜀记》中，逐日记载了由山阴到夔州的所经之地，所历之事，所观之景，以及由此引发的感想与思考。就所记事物而言，大体可以分为四类：自然景观，历史遗迹，民情风俗，人事交际。作为游记，前三类是其主要笔墨所在。游记记游，人在其中，总会有所抒发，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记什么，怎样记，却是以客观的姿态来展现写作者的潜在意识，更能体现作者的个性。陆游《入蜀记》在近乎半年的行程记载之中，无论所经，还是所想，他都是以学者的态度，历史的眼光，从文化积淀的角度，来审视自然山水与人文创造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他的审美感受中，传达了一种鲜明的历史文化的价值取向，使山水的游赏、风物的观览与历史的思考、诗情的共鸣结合起来，从而与他的抗金志向、爱国热情融为一体。

从山阴到夔州，陆游乘船，经运河，入长江，一路西行，以船为家，虽然辛苦又生活不便，却有徜徉于山水的快乐，沿途景色，络绎不绝地出现在他的笔下。就《入蜀记》的记载看，每每在动心悦情之际，他便会联想起前人描画此地景物的诗句。于是，他的思绪与情感也就由此而飘向历史的时空，或赞叹前人诗句描画之

工,或评说诸种诗句之最妙,或感慨今日始得领略前人诗中之境。当其吟哦之际,眼前的自然景物不再是纯然的、孤立的外在,而成为人所共赏的佳致,情景交会,古今相通,人对山川景物的热爱之情也就油然而生。如,他至长芦,观“江面渺弥无际”,便想起李白的诗句:“维舟至长芦,目送烟云高”;过牛渚,见江面窄狭,微风浪作,便想起刘禹锡的诗句:“芦苇晚风起,秋江鳞甲生”;胸怀骤然开阔。夜坐观月,见“影入溪中,摇荡如玉塔”,便感慨“始知东坡‘玉塔卧微澜’之句为妙也”;登鄂州(今武昌)石城山,西望汉阳,便想起李白的诗:“谁道此水广,狭如一匹练。江夏黄鹤楼,青山汉阳县。大语犹可闻,故人难可见。”感叹“形容最妙”;知音会赏,一时而神游千载。当溯流而无风,舟行缓慢,人未免心急,陆游写道:“是日风静,舟行颇迟,又秋深潦缩,故得尽见老杜所谓‘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也。”因此而陶醉于诗情画意之中。有时观赏远方景物,一想到前人曾经亲近,他就生出深深的遗憾:“远山嶄然,临大江者,即铜官山,太白所谓‘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是也,恨不一到。”有时面对景物,他会想起许多相关的诗句,想起那些曾经到过此地的诗人,通过形象的描写,通过诗句的吟诵,他与前人在此景色中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心灵交会。如他过西塞山时的情景:

晚过道士矶，石壁数百尺，色正青，了无窍穴，而竹树迸根，交错其上，苍翠可爱，自过小孤，临江峰嶂无出其右。矶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渔父辞》所谓“西塞山前白鹭飞”者。李太白《送弟之江东》云：“西塞当中路，南风欲进船。”必在荆楚作，故有中路之句。张文潜云：“危矶插江生，石色擘青玉。”殆为此山写真。

检《入蜀记》中描写山水景色而引前辈诗句达一百一十六次之多，所及诗人有李白、杜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近二十人，数量颇为可观。面对自然造化的奇功，遥忆前人的诗句，陆游在表达自己对山水的赞赏之情的同时，又由自然而进入历史，进入文学，而使他的赞赏赢得一种支持的力量，使他对自然山水的陶醉获得一种心灵的快慰。在他的赞赏中，山水胜景是具有历史与文化的内涵的。唯其如此，才格外美。

《入蜀记》逐日记载船行所经之地，有城镇，有乡村，有名胜，而激动陆游的思绪与联想的，往往是一些与历史事件相关的地点。这些相关的历史事件，一为远事，即六朝隋唐之事；一为近史，即北宋之事。而无论近史还是远事，又多涉战乱，透出一种沧桑之感。这样的联想取向，显然包含了陆游对南宋国势的关切。

从临安沿运河西行，从镇江入长江西上，沿途经过之地，既是六朝故地，又是南唐旧土，也是南宋退守江

南的江防，最能唤起陆游的历史感慨与现实思考。如过奔牛闸，他便想到刘宋时沈怀明筑垒抗击孔觐之事，于是写到：“闸水湍激，有声甚壮。”如过牛渚，他便想到隋平陈、北宋灭南唐，都是由此地过江而成就大业，而此地江面狭，“微风辄浪作不可行”。读这些文字，可以想见陆游立在船头，迎面江风，眺望两岸而遥想当年，可以感受到他思绪起伏的胸涛。又如，过皖口，望皖山，他便想到南唐李璟失淮南之地而迁都豫章时，过皖口有“悲愤欷歔”之事；过沌口，他便想到西晋末年的战乱中，北方人士的王澄弃荆州而走，而荆州人郭舒则留屯沌口；梁陈嬗替之际，王琳奉梁而不肯附陈霸先，侯安都率军从建康而上，讨王琳至沌口，“皆此地也”；语意十分沉重。陆游著有《南唐书》，熟悉这一段史事，而且有过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因此《入蜀记》在提到南唐君主时多批评其昏庸无能，而对六朝政权的短期更迭，陆游则更多一些白云苍狗的悲凉感。故在经由沿途地点之时，在往事的叙述之中，他表达了一种兴衰嬗变的历史思考。如船过丹阳，运河两岸土堤高耸，他写到：“自京口抵钱塘，梁陈以前不通漕，至隋炀帝始凿渠八百里，皆阔十丈，夹冈如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朝廷所以能驻蹕钱塘，以有此渠也。”如在池州，他写到：“初王师平南唐，命曹彬分兵自荆州顺流东下，以樊若冰为

乡导,首克池州,然后能取芜湖、当涂,驻军采石,而浮桥成。则池州今实要地,不可不备也。”这些思考在经过建康(今江苏南京)这一六朝旧都、江东要地之时,就直接表达为对南宋政治形势的分析,甚至军事上的建议。在《入蜀记》中陆游写到,至金陵前,船“过龙湾,浪涌如山,望石头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缭绕如垣墙。”遂发议论说:“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变,必先固守石头,真控扼要地也”。当登石头山,“西望宣化渡及历阳诸山”,不禁感慨:“真形胜之地,若异时定都建康,则石头当仍为关要”。又进一步分析说:“或以为今都城徙而南,石头虽守无益,盖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横贯城中,六朝立栅断航之类,缓急不可复施。然大江天险,都城临之,金汤之势,比六朝为胜,岂必依淮为固邪?”陆游的这些议论虽是身临其地,触景而发,却并不是就历史说历史,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高宗绍兴年间,南宋朝廷之上有过关于定都钱塘还是迁都建康的争论,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坚持以临安为都,理由多多,实以其地近海,便于逃跑躲避,而主战者,先有宗泽,后有张浚、陈亮,都力主要图谋恢复中原,就当定都关中,若不能,就当以建康为都。尽管高宗以苟安求免,驻在临安,主和派的意见占了上

风,但这一争议并未终止,一直持续到孝宗即位之后。张浚曾慷慨激昂地陈说:“东南形势,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怀愤惕。至如钱塘,僻在一隅,易于安肆,不足以号召北方。”(《宋史》卷三六一)陆游的主张自然同于张浚等人。他在任枢密院编修时,写有《上二府论都邑札子》,论述以建康为都城的重要性。在文章中,他举孙吴、萧梁、南唐为例,谓其偏居江南,也曾有不以建康为都之时,然而,“其当时为计,必以建康距江不远,故求深固之地。然皆成而复毁,居而复徙,甚者遂至于败亡。”他说:“天造地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也。车驾驻蹕临安,出于权宜,本非定都,以形势则不固,以馈饷则不便,海道逼近,凜然常有意外之忧。”故希望朝廷以“建康、临安,皆系驻蹕之地”,而若可接受,他愿进一步呈说定都措置的意见。由于临安作为都城已是事实,陆游在陈说意见时,为使朝廷重臣认识建康地位的重要,采取了两都同设并存的办法,而他的实质意见仍是以建康为重。在写作《入蜀记》之时,陆游早被摒除在政治中心之外,在历任镇江通判、隆兴通判之后,他被任命的仍然是一通判之职,而且要远赴夔州,是那样一个荒僻穷陋的地方。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地位上,当船过建康,当身临石头,陆游仍然情不可止地要评论历史,评说形势,一如其

诗中所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当船过池州，陆游又写到：“州唐置，南唐尝为康化军节度，今省。又尝割青阳隶建康，今复故。惟所置铜陵、东流二县及改秋浦为贵池，今因之。盖南唐都金陵，故当涂、芜湖、铜陵、繁昌、广德、青阳并江宁、上元、溧阳、溧水、句容凡十一县，皆隶畿内。今建康为行都，而才有江宁等五邑，有司所当议也。”又从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上作探讨，希望加强建康江防之地的实力。

在《入蜀记》中，陆游所经过的自然景观也好，历史遗迹也好，本是物化形态的存在，而经由他的评赏，化为了有血有肉的情感寄寓。沿途景致，优先进入他的眼眶的，是与历史文化相关联者，他的评赏方式，又是从历史中搜检史事或诗句，这就使他在山水游历之时的观赏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认同方式。他以一个学者的知识来讲述这些地方的过去，以一个诗人的才情来赞美这些景致的特色，又以自己的发现去认同前人的美感，以自己的感受去体察前人的经历。在他的观赏中，眼前景致不再是一幅幅平面的图画，而具有了历史的纵深之维，让人透过当下的宁静而感受此地曾经发生的变幻风云。在他的观赏中，他不再是一位孤独的远行者，他通过景物的存在而获得了与前人的交流与感应。陆游在游历中的这种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不仅在

时空上拓展了景物的内涵,使之或意义丰厚,或意味隽永,或沉重,或有趣,更使这些景物因为与历史文化的密切关联而与人产生了密切的感情联系。陆游是第一次入川,建康以上的沿途,他是第一次经由,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文化的认同意识,在他的笔下,那些本属陌生的景色变得熟悉起来,而显得十分亲切,那些他曾在书中读到过的史事与诗句,也由于置身其中而变得生动起来,让人浮想联翩,让人检讨现实。读《入蜀记》可以感觉得到,陆游这位爱国主义诗人的情感之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有着十分具体的生活内容充实于其中,它包含了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山川的热爱,对习养心灵的历史文化的珍惜。清人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中谈到《入蜀记》时就有这样的感慨:“凡途中山川易险,风俗淳漓,及古今名胜战争之地,无不排日记录,一行役而留心世道如此,后时‘家祭毋忘’,盖有素焉。”

三

《入蜀记》本来没有单行本,是被编纂在陆游的散文集《渭南文集》之中。陆游非常看重自己的诗文创作,说是“百岁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衰疾》);“此身死去诗犹在,未必无人粗见知”(《记梦》)。仕途蹉跎,一心报国而志向未成,陆游是将自己的一生